

试论中俄政论作品语言的褒贬风格

作者：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 张举玺

[摘要] 政论性作品在中俄报刊媒体文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文章具有鲜明的观点、立场和态度，能直接引导舆论导向，实施舆论监督。政论作品的作品质量和影响效果取决于作者选用政论性语言的褒贬力度。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俄两国政论性新闻语言的形成原因不同。政论性语言的褒贬风格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 政论作品 政论语言 褒义词 贬义词 中性词

社论、编辑部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和编者案等政论性体裁作品具有舆论导向作用。其表现力度和传播效果在于其所使用新闻语言的褒贬力度。新闻语言的褒贬强弱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质量和影响效果。政论作品所使用的新闻语言主要是那些具有社会政治内容和意义的词汇和成语。这些词汇和成语在政论作品语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

一、俄罗斯新闻语言褒贬原则曾一度发生错乱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其原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被突然摧毁，意识形态领域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苏联基础上独立的俄罗斯，社会评价标准、公正原则、政治威信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原来属于褒扬的词汇变成了贬义词，比如，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宣传、专政、无产阶级、主权、爱国主义、苏维埃、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模范等；而原本被当作贬义词使用的词汇，却变成了褒义词，比如，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民主的、民族主义、农场主、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商业、商人、买卖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私有化、私有财产、私人买卖、私营工厂、拍卖、宗教自由等等。

一部分既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同时又富有表现力和评价功能的单词或术语，比如爱国者、机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分子、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贪赃枉法、腐败分子等一时没了用场。

面对这种局面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俄罗斯媒体一时无所适从。就连“同志”这个具有褒义色彩的日常称呼也不得不突然停止使用。转称西方社会常用的“先生”和“太太”又实在无法从心理上接受。最后，媒体被迫使用“男人”代替“男同志”，“女人”代替“女同志”。

思想领域里某些特指词汇完全由褒义转换成了贬义角色。如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反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反革命者等。

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院长科斯达玛罗夫院士指出，“社会制度突然脱离无产阶级原则，导致人们不得不矛盾重重地重新审视那些有关道德标准和社会公议性的词汇。”[2]



俄罗斯政论作品争论的最多话题是现实问题，所以政论作品中突然涌现出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问题或专题词汇。文章里还出现了一些口语结构，其作用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政论体词汇。与此同时，那些具有感情色彩和评价意义的词汇也被赋予了褒贬性色彩。

一批中性词汇一经用于政论性作品，也被赋予了褒贬色彩，广泛使用于传媒作品当中。并且，其使用频率还相当高，比如年、新、工作、其他（其它）、大、人、事业、时间、地区、力量、言论、给予、生命、每个；总统、联邦、民主制、民主派、民主、社会、公正性、国家、政府、政权、政权分支机构、人民、公开性、主权、宪法、言论自由、人权、护法、反对党等。

二、中国新闻语言坚持褒贬有度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劲活力，国民经济高速度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这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新闻事业传承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功能、道德标准，保持了新闻是给社会主义发展鼓劲的主题，所以中国新闻政论体裁的作品对社会优良品德随时给予高度赞扬，对不良现象及时给以鞭笞和引导，充分发挥了褒贬有度，舆论监督得体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现代汉语中涌现出一大批带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和成语。这些词汇和成语主要是通过媒体使用而产生的。所以有学者把这些词汇直接称作“媒体语言”或者“新闻语言”。

经过观察和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词汇产生的根源主要集中于下列领域：经济领域，用以表明市场的关系；财贸领域，用以描述企业活动；科研技术和生产工艺领域，用以说明电子产品的各项功能；日常生活语言领域，新型体育名词和体育运动项目。[3]

所有这些词汇、词组和成语都具有生产、职业和专业术语的特性，表示事物和动作的名称。

一些词汇不仅广泛用于纸介媒体和因特网，而且也频繁出现于广播和电视语言之中，甚至演讲报告中。比如私有化、自由主义、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外汇汇率、外汇兑换、经济封锁、货币干预、政府干预、交易所、私下交易、暗箱操作、预算、影子经济、灰色经济、泡沫经济、洗钱；因特网、电脑、电脑控制、智能机器人、打印机、计算机控制、显示器、新建文件夹、喷墨打印机、墨盒、激光打印机、硒鼓；移动硬盘、U盘、光碟、软驱、光驱、主机板、声卡、显卡、原装、水货、品牌机、拼装机；影碟机、数码相机、数码冲洗、背投电视、超薄电视；微波炉、电磁炉、全自动、半自动等。

有些带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是由那些包含对事件、现象、概念、局势和人物等评价性意义的单词组成。作者借助于这些词汇来表达自己同某个事件、某种行为或某一社会团体的关系。比如，捍卫祖国的利益、捍卫祖国统一、反击台独、勇气、坚强、精神、蛮横无礼、破坏文物的行为、枷锁、封锁、反恐双重标准等。

除了使用褒贬词汇和具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之外，近年来，中国媒体还在频繁地使用一些中性词汇，比如信息、自动化、书记、省长、年、月、新技术、专利、市场、挣钱、崛起、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垄断等。

三、评价性词汇在中俄新闻作品中涌现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少行业术语和绕口令被当作褒贬词汇使用。其中一部分词汇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常常出现在报纸、广播和电视里。目前，虽然这种行业术语和词汇依然见之报端，但是其评价功能更具有针对意义。经常用于报纸、因特网的行业术语和绕口令词汇、成语实在是不少，即便是粗略统计一下，也能发现成千上万的词汇。据奥日科夫和什维多娃的《俄语详解词典》显示，作者新近收入、并注解的词汇占词典容量的四分之一[4]。这与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显露的情况基本相似。这就是说，在中俄现代标准语言里，新词正在冲击着传统词汇的标准规范。在这些新词中，具有评价色彩的词汇占绝大多数。



他们不仅用在报刊上，也广泛用于广播和电视语言里。

评价性词汇的典型特征在于其表达力。它不仅兼收表达能力强的文学词汇和专业术语，也大量并取大众性口语词汇。这种趋势在最近 10-15 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交替时期，评价性词汇在俄罗斯层出不穷。比如“社会改制”。这个动名词在苏联解体之前表示“改革”的含义。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改革”这个词在苏联十分流行。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则变成了“改制”。再比如，“加快”。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个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使用的十分普遍。

“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教育空间等）、“发展平台”、“上流社会”等来源于书面语。“流动”本来是一个地质学术语，现在则用来表示如“人才流动”。

另外，“无界限”、“拆卸”、“解体”、“投入”、“冻结”、“痴迷”、“过劳”、“配音”等则来源于专业术语。

这些词汇大批运用到政论性作品之中，在其评价色彩的影响下表达出这样或那样的含义，对中心主题发挥着各种修饰作用，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度。[5]

形形色色的中性词和术语被广泛用作比喻，而赋予了评价意义。这些词通常被用于词组当中，表示激情洋溢的色彩。

比如，在苏联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纪之风”、“东风压倒西风”、“人民的怒潮”、“民愤”、“人民兄弟”、“城市兄弟”、“农民兄弟”等词组普遍用于政论作品，表示特殊的阶级感情。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些科技术语被广泛用作比喻。比如“冷漠的海洋动物”、“冷血动物”、“墨守成规的人”、“战争狂人”等。一些中性词组已经成为固定的代名词，比如“冷落的战舰”、“遗弃的船”、“病毒变异”、“破坏”、“世纪瘟疫”等。[6]

经过对中俄两国政论作品的比较和观察发现，文章的表现力决定于“作者”。记者们在表达自己的激情时，往往会选择一些相互呼应的词汇、成语和句型等语言素材，用特殊的句法手段将这些素材有机地编织成文章。他们常用的不仅有一般句型，也有诗句、排比句、重复句等其它句型。

这样，政论作品一般是由褒义词汇、贬义词汇、带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评价性词汇和政论性成语等组成的。社会制度对新闻语言影响很大，新闻词汇的构成取决于国家的方针政策。政论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些社会现实问题，政论文章中所使用的词汇涉及到各个行业的具体问题。

由于俄罗斯改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两国媒体语言中产生了许许多多新词和词组。这些词汇涉及到各个领域。媒体记者和其他各界知识分子使用这些词汇，对所发生的事件、周围的现象、有关社会概念、时事和人物等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